

小额信贷、农民创业与收入增长

——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冯海红^{1,2}

(1.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齐鲁工业大学 金融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基于2009—2014年山东省17地市小额贷款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检验小额信贷的农民增收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由于小额信贷规模仍相对较小,因此其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仍相对较低。同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农民创业在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所以,为了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小额信贷的发展以及加大对农民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关键词] 小额信贷;农民创业;收入增长;中介效应;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民增收;非正规金融;农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6)05-0111-09

一、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民增收难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等问题日益突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农民创业是破解“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是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双引擎”之一。这充分显示出政府对创业和创新的重视,以及创业和创新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农民自主创业的群体也在不断壮大。截至2014年末,我国农村私营企业投资者达到733.1万人,农村个体就业人数达到3575.2万人^①。积极推动农民创业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的有效途径。

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农民创业过程中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由于低收入农户和微型企业往往缺乏充足的抵押品和良好的信贷记录,贷款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正规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向其贷款。为了缓解“三农”的融资困境,进一步完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以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2005年,我国开始进行小贷公司试点。2008年,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小额贷款公司在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下自主选择贷款对象。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随后,小贷公司在全国逐步推开并迅速发展,成为地方微型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正规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据统计,截至2015年末,全国共有小贷公司8910家,贷款余额9412亿元,从业人员117344人,实收资本8459亿元^②。

[收稿日期] 2016-04-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333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273155);齐鲁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SKXMY1511)

[作者简介] 冯海红(1979—),女,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讲师,从事小微金融、金融市场研究。

^①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

^②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

小贷公司的目标具有双重性,既肩负着服务农民等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目标,又承担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目标。那么,小贷公司是否真正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而惠及普通农民?小贷公司发放的小额信贷是否影响农民的收入?如果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具体有多大?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由于数据的限制,现有研究对这些问题仍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答案。鉴于此,本文使用山东省小贷公司的地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我国小额信贷的农民增收效应以及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

二、文献回顾

(一) 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随着小额信贷机构在世界范围的蓬勃发展,关于小额信贷对居民的社会经济福利影响,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探讨。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小额信贷对于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Khandker 使用孟加拉国的面板数据,结果显示小额信贷有助于降低参与者的贫困,并且极端贫困的家庭受益更多,同时小额信贷也有助于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1]。Imai 和 Azam 的研究表明,孟加拉小额信贷对于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指出生产性小额信贷有助于提高家庭人均收入^[2]。Imai 等使用 48 个国家的宏观数据,采用人均小额信贷量衡量各国小额信贷的发展规模,指出在宏观层面上小额信贷显著降低了贫困^[3]。张立军和湛泳提出小额信贷增加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4]。孙若梅研究发现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作用与使用贷款次数有关,重复使用比一次性使用贷款作用大^[5]。胡宗义等使用非线性平滑转移回归模型,验证了小额信贷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6]。

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另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小额信贷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或者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尽管小额信贷机构广泛存在,但它们的信贷活动占比仍相对较低。龙华平等指出小贷公司虽然对农民收入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7]。杨虎锋和何广文提出小贷公司的平均单笔贷款额度较大,倾向于服务县域内的微小企业和农村大户,其服务微小客户的社会目标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盈利目标之间存在冲突^[8]。

(二) 小额信贷、农民创业与农民收入的交互影响

一些研究发现小额信贷与农民创业以及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一方面小额信贷推动了农民创业,另一方面农民创业又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Lensink 和 Pham 考察了越南小额信贷对居民自主创业利润的影响,结果显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9]。Banerjee 等提出小额信贷为借款者增加了新的创业机会^[10]。Crepon 等发现摩洛哥小额信贷显著提高了借款者对畜牧业和农业的投资,并带来农民自主创业利润的增长,而农民创业又带来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的增长^[11]。韦吉飞和李录堂研究发现农民创业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12]。马光荣和杨恩艳提出非正规金融为农民自我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持^[13]。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的评价标准和选用的数据、计量方法的不同,现有研究关于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结论仍是众说纷纭,并在较大程度上受地域差异和小贷项目设计差异的影响。再由于我国小额信贷起步较晚,小贷公司数据样本稀缺,学者关于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三、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问题,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对本国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干预过多、管制过严,从而抑制了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时滞后发展的金融体系又限制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金融抑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14-15]。在金融抑制下,政府对利率、汇率和信贷实行严格的管制,使金融价格背离现实发生扭曲,导致严重的资金需求缺口,银行只能以“信

贷配给”方式进行授信,并把贷款主要贷放给拥有特权的国有大型企业。大量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地处偏远农村的农民和小工商业者的贷款需求更加难以得到满足,金融约束成为抑制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在金融抑制理论的基础上,麦金农和肖又提出金融深化理论,所谓金融深化是指政府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取消对金融的过分干预,使利率和汇率充分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变化,实现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14-15]。麦金农和肖制定了一套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政策来推动其金融深化,其中包括允许非国家化、非银行化的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鼓励各种性质、各种类型的机构、企业、公众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活动^[14-15]。根据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收入效应、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就业效应四种积极效应。其中,收入效应是指金融深化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金融抑制和融资约束。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采取金融深化政策,大力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逐步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2006年允许设立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以及资金互助社在内的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8年在全国开展小贷公司的试点,实现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发展,缓解了农民的融资约束,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小额信贷和农民收入间呈正相关性,即小额信贷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

关于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分析金融发展规模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经济增长被看作金融发展作用于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主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收入的逻辑主线。20世纪90年代新兴起来的“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理论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批判,提出金融发展的关键不在于金融发展规模,而在于金融配置效率。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最关键的指标是“任何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或拥有合理项目的创业者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并建立起“金融发展—企业家创业—收入增长”的逻辑关系。

“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理论是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在金融发展理论中的复兴。熊彼特在1912年最早提出“创新”一词,他指出所谓创新就是要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而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的主体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并首次提出金融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筛选具有创新精神的的企业家,为其提供融资并促进经济增长^[16]。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对全球各国金融改革及金融发展的深刻反思,King和Levine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应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具体包括筛选最有可能成功创新的企业家、为企业家筹集资金并降低筹资成本、为创新提供风险分担机制、评估创新的潜在收益^[17]。通过构建三部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Banerjee和Newman指出金融发展可以使许多收入水平较低的人获得资金支持,实现自我雇佣或成为企业家,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成为企业家,从而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劳动需求,并提高收入水平,首次构建了“金融发展—企业家创业—收入增长”的逻辑主线^[18]。为缓解农民融资难题,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小贷公司等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并积极鼓励小贷公司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小额信贷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农民自主创业和农民收入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基于“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理论,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小额信贷发展通过影响农民创业,进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农民创业在小额信贷的农民增收效应中具有中介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9—2014年山东省17地市小贷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山东省于2008年9月开展小贷公司的试点工作,随后小贷公司迅速发展,从最初的10余家增加到

2015年的300余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末,山东省共有小贷公司339家,从业人员4722人,实收资本435亿元,贷款余额482亿元^①。从2008年的试点到随后的快速发展,山东省小贷公司一直紧跟国家政策并走在全国的前列,同时山东省作为我国的经济金融大省和农业大省,其产业结构和“三农”发展在全国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山东省小贷公司样本具有较强的区域小贷公司的代表性,可以代表全国小贷公司的基本发展状况。

本文数据来自山东省小额贷款协会提供的2009—2014年山东省17地市小贷公司的月度统计数据,涵盖2009年以来山东省小贷公司的贷款信息、财务信息和融资信息等多方面的数据,详尽反映了山东省小贷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情况,为全面分析小贷公司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靠而有力的数据支撑。其中,小贷公司贷款按资金投向具体划分为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和其他贷款。本文采用小贷公司发放的涉农贷款数据,实证分析小贷公司涉农贷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文中反映地市经济金融特征和农业生产特征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山东统计年鉴》、《山东金融年鉴》和各地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 变量选取

1. 农民收入。参照以往的研究,本文选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农民收入水平,并用2009年为基期的各地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2. 小额信贷。借鉴Imai等用人均小额信贷量来衡量小额信贷发展规模的做法^[3],本文选取小贷公司发放的人均涉农贷款作为衡量指标,用来反映小贷公司发放的农业小额信贷规模。由各地市小贷公司的年涉农贷款累计发生额与农村总人口数之比得到(即人均涉农贷款额),并用2009年为基期的各地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消胀处理。

3. 农民创业。考虑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我国农民创业的主要形式是创办私营企业和从事个体经营,所以在韦吉飞和李录堂的研究基础上^[12],本文选取农村私营企业投资者和农村个体就业人数占农村总人口数的比重作为反映农民创业情况的代理指标,用以衡量区域农民的创业活跃程度。

4. 控制变量。参考Imai等文献的做法^[2-3],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农民收入的变量。

(1)第一产业增加值。它来自于各年度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村总人口数之比(即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用来反映各地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2)正规金融发展。它用各地市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与GDP之比来衡量,反映当地正规金融发展的规模和程度。(3)财政支农。它用各年度财政支农数额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衡量,反映当地政府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支农的数据采用的是《山东统计年鉴》各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数额。(4)粮食产量。它来自于各年度粮食总产量与粮食种植面积之比(即每亩粮食产量),反映当地农村的粮食产量情况。

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处理。同时,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本文对各名义变量如农民收入、小额信贷、第一产业增加值等均以2009年为基期按照各地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处理。

文中各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见,由于山东省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市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时,山东各地市的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数额差异也较大,反映出各地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三) 模型设定

1.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1,即检验小额信贷的农民增收效应,我们运用如下回归模型:

$$\ln income_{it} = \beta_0 + \beta_1 \ln microloan_{it} + \beta_2 X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①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

其中, i 代表山东各地市, 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ln income_{it}$ 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自然对数; 关键解释变量 $\ln microloan_{it}$ 为小贷公司小额信贷, 用小贷公司人均涉农贷款的对数值来表示。 X_{it} 表示反映地市经济特征和农业生产特征的控制变量, 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正规金融发展、财政支农和粮食产量。 u_i 代表地区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β_0 、 β_1 、 β_2 代表待估计参数。

表 1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income</i>	农民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102	9467.518	2297.824	5047.164	15065.63
<i>microloan</i>	小额信贷	小贷公司涉农贷款额/农村总人口数(元/人)	102	1008.206	1973.297	0.0688	14040.3
<i>selfemploy</i>	农民创业	农村私营企业投资者和个体就业人数之和/农村总人口数	102	0.0741	0.0417	0.0238	0.275
<i>addvalue</i>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总人口数(元/人)	102	7557.284	3122.337	2716.52	16607.1
<i>credit</i>	正规金融发展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102	0.7505	0.3067	0.4368	1.8178
<i>public</i>	财政支农	财政支农的数额/第一产业增加值	102	0.1502	0.0458	0.0847	0.2940
<i>crop</i>	粮食产量	粮食总产量/粮食种植面积(公斤/亩)	102	434.4368	36.7801	343.6491	532.5057

2. 为了研究假设 2, 即检验农民创业在小额信贷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中介效应, 本文借鉴 Baron 和 Kenny^[19] 以及温忠麟^[20] 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检验小额信贷是否通过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实现农民增收效应, 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ln income_{it} = \beta_0 + \beta_1 \ln microloan_{it} + \beta_2 X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ln selfemploy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microloan_{it} + \alpha_2 X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ln income_{it} = \gamma_0 + \gamma_1 \ln microloan_{it} + \gamma_2 \ln selfemploy_{it} + \gamma_3 X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在模型中, $\ln income_{it}$ (农民收入) 为中介效应检验的被解释变量, $\ln microloan_{it}$ (小额信贷) 为中介效应检验的解释变量, $\ln selfemploy_{it}$ (农民创业) 为中介变量。 i 代表山东各地市, t 代表年份, u 代表地区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β_i 、 α_i 、 γ_i ($i = 0, 1, 2, 3$) 为模型回归系数。

中介效应检验用以评估, 在解释变量 (小额信贷) 对被解释变量 (农民收入) 影响中, 中介变量 (农民创业) 是否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传导效应。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 第一步对模型 (1) 进行回归, 检验解释变量小额信贷与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的回归系数 β_1 是否显著, 如果系数 β_1 显著为正, 说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农民增收效应, 继续第二步, 如果不显著则停止检验。第二步对模型 (2) 进行回归, 检验中介变量农民创业与小额信贷的回归系数 α_1 是否显著, 如果系数 α_1 显著为正, 说明小额信贷支持了农民创业。第三步对模型 (3) 进行回归, 如果系数 γ_1 和 γ_2 都显著为正, 且系数 γ_1 与 β_1 相比有所下降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如果小额信贷的回归系数 γ_1 不显著, 但农民创业的回归系数 γ_2 显著, 则说明农民创业发挥了完全中介的作用。结合本文所研究的问题, 中介检验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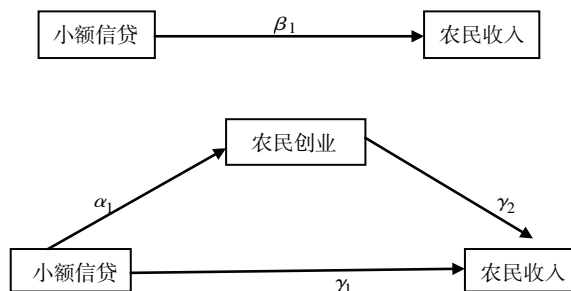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检验

五、实证分析

(一) 小额信贷的农民增收效应

1. 基本估计结果。本文运用 Stata12 软件,对模型(1)进行回归。面板设定的 F 检验的结果表明个体效应十分显著,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同时, Hausman 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估计有效的原假设,表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各参数进行估计,并进行了多次固定效应回归,基本估计结果如表 2 的第(1)列至第(3)列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所有模型中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小额信贷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小额信贷的规模越大,农民收入水平越高。在具体影响程度上,由表 2 第(3)列所示,小额信贷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农民纯收入就会增加 0.0537 个百分点。

就控制变量而言, *lnaddvalue* 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lncredit* 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正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也越高。财政支农的估

计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说明财政支农有效地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粮食产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粮食产量对农民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随着农民收入渠道的拓宽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民依靠粮食增加收入的依存度不断减小,农民收入受粮食产量的影响逐步降低。同时,从具体影响程度上而言,明显可以看出小贷公司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影响系数远低于第一产业增加值、正规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的影响系数。这说明由于小贷公司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发展规模还较为有限,信贷市场份额较小,所以对农民收入虽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仍相对较低。

2. 内生性问题及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因为政府和机构可能更倾向于向较贫困地区的小贷公司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21]。为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周边地市小贷公司的数量均值和注册资本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比如,以济南为例,它周边的地市包括泰安、莱芜、淄博、滨州、德州和聊城六地市,则以这六地市小贷公司的数量均值和注册资本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之所以选取这样的工具变量,一方面是由于地区聚集效应的影响,周边地市小贷公司的数量均值和注册资本均值和该地市小贷公司的贷款规模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小贷公司不可以跨县区经营,所以周

表 2 小额信贷的农民增收效应基本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lnincome</i>			
	(1) FE	(2) FE	(3) FE	(4) FE-AV
<i>lnmicroloan</i>	0.0557 *** (8.50)	0.0548 *** (8.86)	0.0537 *** (8.59)	0.0939 *** (6.32)
<i>lnaddvalue</i>	0.3497 *** (6.34)	0.3341 *** (6.40)	0.3372 *** (6.46)	0.1431 * (1.83)
<i>lncredit</i>	0.4818 *** (4.15)	0.3992 *** (3.56)	0.4239 *** (3.72)	0.4134 ** (2.59)
<i>lnpublic</i>		0.1901 *** (3.34)	0.1957 *** (3.43)	0.1746 *** (2.71)
<i>lncrop</i>			0.2250 (1.14)	0.0274 (0.12)
常数项	5.8803 *** (11.94)	6.3623 *** (13.07)	4.9955 *** (3.87)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102	102	102	102
R^2	0.8927	0.9057	0.9072	0.8592
面板设定 F 检验	15.46 [0.0000]	17.75 [0.0000]	17.81 [0.0000]	
Hausman 检验	18.14 [0.0012]	18.46 [0.0024]	18.11 [0.0060]	
Kleibergen - Paap rk LM 统计量				15.469 [0.0004]
Cragg-Donald F 统计量				45.72 {19.93}
Hansen J 统计量				2.243 [0.1342]
C 统计量				19.964 [0.0000]

注:(1)()内数值为 t 值或 z 值,[]内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p 值。{ }内数值为 Stock - Yogo 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2)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下同。

边地市小贷公司的数量均值和注册资本均值对该地市的农民收入不存在直接影响,满足外生性条件。所以,上述两个变量均满足工具变量的两个条件。

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2 第(4)列所示。为了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对工具变量进行了多种检验:(1)Kleibergen - Paap rk LM 检验在 1% 的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2)为了考察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 - Donald F 统计量的结果为 45.72,明显大于 Stock - Yogo 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 19.93,故而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不必担心弱工具变量问题。(3)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的伴随概率为 0.1342,接受工具变量是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4)对解释变量小额信贷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C 统计量的伴随概率为 0.0000,在 1% 的水平上拒绝小额信贷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说明小额信贷是内生的解释变量,也说明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做法是合理的。通过以上对工具变量的检验,表明采用周边地市小贷公司的数量均值和注册资本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是相对可信的。

FE - IV 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考虑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变量的估计系数仍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小贷公司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基本模型一致。具体而言,小额信贷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将带来农民收入增长 0.0939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引入周边地市小贷公司的数量均值和注册资本均值两个工具变量后,估计结果中小额信贷的估计系数大为提高,是 FE 估计系数的 1.75 倍。这表明本文所构造的工具变量非常稳健,也进一步说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二) 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 Stata12 软件,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回归。对于模型(2)和模型(3),面板设定的 F 检验的结果表明个体效应十分显著。同时,模型(2)和模型(3)的 Hausman 检验接受了随机效应估计有效的原假设,故应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 Step I 首先对小额信贷是否具有农民增收效应进行了验证,回归结果中小额信贷的系数为 0.0537,并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农民增收效应。在 Step II 的回归中,小额信贷与农民创业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小额信贷与农民创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农民获得的小额信贷越高,农民创业程度越高,小额信贷的发展越有利于推动农民自主创业。在 Step III 的回归中,在小额信贷的农民增收模型中加入农民创业变量后,小额信贷与农民创业的估计系数都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加入中介变量后,小额信贷的估计系数由 0.0537 下降为 0.0445,这表明农民创业在小额信贷的农民增收效应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综上所述,小额信贷的发展为低收入农民提供了灵活的资金支持,缓解了农民的融资约束,有利于农民把握住有利的创业机会,推动了农民自主创业,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民自主创业是小额信贷实现农民增收效应的一个重要作用渠道。

表 3 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Step I 被解释变量: <i>lnincome FE</i>	Step II 被解释变量: <i>lnselfemploy RE</i>	Step III 被解释变量: <i>lnincome RE</i>
<i>lnmicroloan</i>	0.0537 *** (8.59)	0.0452 *** (3.15)	0.0445 *** (6.96)
<i>lnselfemploy</i>	—	—	0.1819 *** (5.13)
<i>lnaddvalue</i>	0.3372 *** (6.46)	0.7935 *** (7.24)	0.2515 *** (5.62)
<i>lncredit</i>	0.4239 *** (3.72)	0.4820 ** (2.40)	0.0334 (0.55)
<i>lnpublic</i>	0.1957 *** (3.43)	0.3181 ** (2.54)	0.1154 ** (2.32)
<i>lncrop</i>	0.2250 (1.14)	0.2894 (0.66)	0.0336 *** (0.20)
常数项	4.9955 *** (3.87)	-10.9699 *** (-3.90)	7.1715 *** (6.57)
样本数	102	102	102
R ²	0.9072	0.8281	0.8947
面板设定 F 检验	17.81 [0.0000]	31.79 [0.0000]	7.28 [0.0000]
Hausman 检验	18.11 [0.0060]	10.94 [0.0657]	11.85 [0.0740]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新兴的“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理论,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支持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活动,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抑制和融资约束是限制企业家创业活动的瓶颈^[16]。小贷公司等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有助于弥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缓解农民的创业融资约束并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本文利用2009—2014年山东省17地市小贷公司的面板数据,选取小贷公司发放的涉农贷款作为小额信贷的衡量指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小额信贷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民创业在小额信贷影响农民收入中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小额信贷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正规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也均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粮食产量对农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为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周边地市小贷公司的数量均值和注册资本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依然显示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本文结果具有稳健性。第三,在具体影响程度上,由于小额信贷规模仍相对较小,所以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与第一产业增加值、正规金融发展、财政支农相比仍然相对较低。第四,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小额信贷影响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验证了农民创业在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从而也验证了“小额信贷—农民创业—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表明促进农民自主创业是小额信贷实现农民增收效应的一个重要作用渠道。所以,为了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小额信贷的发展规模,以及对农民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21]。

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双创”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扩大就业和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举措。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民创业创新是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增收的有效途径。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不足,农民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许多进行自主创业农民的信贷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小贷公司等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有利于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融资难题,使低收入农民也可获得信贷资金的支持,有机会走上自主创业之路,从而对于农民创业和收入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目前小贷公司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发展规模还较为有限,所占信贷市场份额仍较小,所以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仍然相对较低。基于此,本文研究具有以下启示:第一,我们要对小贷公司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持有积极的肯定态度,坚定我国小贷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方向,并逐步扩大其发展规模 and 市场份额,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的积极性。第二,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小贷公司的政策优惠措施和扶持力度,缓解小贷公司自身发展中面临的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狭窄、融资环境差等难题,同时健全其风险防控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小贷公司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第三,我们要积极鼓励小贷公司发放涉农贷款并向农民自主创业提供信贷支持,制定并落实相关的税收优惠和奖励措施,使其更好地发挥支农功能。总之,政府应进一步促进小贷公司等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民自主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优化农民创业的融资环境,使更多农民走上自主创业和兴业致富之路,开创我国“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Khandker S.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evidence using panel data from Bangladesh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5, 19(2):263-286.
- [2] Imai K S, Azam M S. Does microfinance reduce poverty in Bangladesh? New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panel data[J]. Journal of Develop-

- ment Studies, 2012, 48(5):633-653.
- [3] Imai K S, Raghav G, Ganesh T, et al.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a macro perspective [J]. World Development, 2012, 40(8): 1675-1689.
- [4] 张立军, 湛泳. 金融发展与降低贫困——基于中国 1994—2004 年小额信贷的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06(11): 36-42.
- [5] 孙若梅. 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 甘肃社会科学, 2008(9): 65-72.
- [6] 胡宗义, 李信曼, 唐李伟. 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 STAR 模型的实证研究[J]. 软科学, 2014(4): 117-134.
- [7] 龙华平, 金敏敏. 小额贷款公司与地方经济互动关系研究——基于贵州省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 2012(10): 106-109.
- [8] 杨虎锋, 何广文. 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能惠及三农和微小客户吗? [J]. 财贸研究, 2012(2): 35-41.
- [9] Lensink R, Pham T.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self-employment profits in Vietnam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2, 20(1): 73-111.
- [10] Banerjee A, Duflo E, Glennerster R, et al. The miracle of microcredit?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R]. Working Paper, 2012.
- [11] Crepon B, Devoto F, Duflo E, et al.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those who take it up: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Mocco [R]. Working Paper, 2012.
- [12] 韦吉飞, 李录堂. 农民创业、分工演进与农村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农村统计数据的时间系列分析[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24-30.
- [13] 马光荣, 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 经济研究, 2011(3): 83-93.
- [14] 麦金农.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15] 肖.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88.
- [16]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17] King R G, Levine R.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2): 717-737.
- [18] Banerjee V, Newman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2): 274-298.
- [19]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2): 1173-1182.
- [20]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 614-620.
- [21] 雷新途, 林素燕, 祝锡萍. 民间借贷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5(6): 97-105.

[责任编辑: 杨志辉]

Microfinance, Self-Employment of Farmer and Income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Mediation Effect

FENG Haihong^{1,2}

-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Shandong Province's micro-credit companies during 2009—2014, the author first use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methods, and then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effect of micro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an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self-employment intermediary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cro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but because microfinance's development scale is limited, its influence degree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Meanwhile, by using the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method, the author verifies that the farmer's self-employment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the effects of micro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So,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finance, and increase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farmer's self-employment.

Key Words: microfinance; self-employment of farmers; income growth; the mediation effect; imbalanc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irregular financ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